

二十一世紀評論

東北亞安全結構：回顧與思考

編者按：2023年3月11及15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第五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邀得華東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沈志華教授主講，題目是「中朝蘇三角關係的歷史脈絡(1921-1991)」。此外，沈教授與李丹慧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教授）、牛軍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進行了一場學術座談會，主題是「朝鮮半島安全結構的變遷(1970-1990年代)」。本期除了將講座和座談會的發言內容整理刊出以外，亦邀請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張璉瑰教授撰文，討論朝鮮核問題的來龍去脈，讓讀者對於東北亞安全結構的緣起和變遷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脆弱的聯盟：中蘇朝三角 關係歷史脈絡(1921-1992)



最近一段時間，朝鮮半島局勢再次緊張起來，中國的政策取向備受半島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關注。在中美關係和朝韓關係都處於尖銳對抗的背景下，一方面美日韓軍事同盟日益加緊，另一方面俄羅斯與朝鮮抱團取暖，並竭力拉中國入夥。此時，中國是否加入正在形成的俄朝同盟，將直接影響東北亞的國際局勢和安全態勢。那麼，中國應作出怎樣的政策選擇？本文回顧中國、蘇聯、朝鮮三國關係變化的歷史，或許可以為此提供一些啟示^①。

一 蘇聯領導中朝，中朝互不往來(1921-1949)

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建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和朝鮮共產黨都是在莫斯科的扶植下成立的，儘管朝共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者之間起到一定的「橋樑」

作用，但中共與朝共從未建立起直接和平行的組織聯繫。1926年初，朝共因在本國無法立足，遂把主要力量和活動轉移至中國，呂運亨、曹奉岩等數十名朝共黨員直接加入中共，成立了上海韓人支部，這是中共黨內唯一的外國人組織，其餘多數人去了東北，並與當地朝鮮革命者共同建立了朝鮮共產黨滿洲總局。

1928年12月，共產國際一紙決議解散了朝共在滿洲的組織，要求他們回國重建中央。不久後，在中國東北的朝鮮革命者，除回國或去蘇聯者外，大都以個人身份加入了中共和東北抗日聯軍（抗聯），其代表人物就是金日成。1941年抗聯殘部退入蘇聯以後，在哈巴羅夫斯克（中方稱「伯力」）建立了抗聯教導旅（蘇聯遠東紅旗軍第八十八特別步兵旅），列入蘇軍編制。崔庸健任八十八旅參謀長、中共東北委員會書記，金日成任一營營長。日本投降以後，蘇聯派金日成率領八十八旅部分成員組成朝鮮工作團回到平壤，協助蘇聯佔領軍開展工作。這些人後來構成了朝鮮勞動黨（以下簡稱「勞動黨」）內的「游擊隊派」（滿洲派）。1945年11月，金日成脫離中共黨籍，後被莫斯科指定為朝鮮領導人。

與此同時，在中國關內的朝鮮革命者也參加了中共領導的革命活動。抗戰期間，他們被中共視為國際友人，以反法西斯國際聯盟的名義在中共中央、八路軍、新四軍中工作，其主要幹部有朴科奉、武亭、朴一禹等。日本投降後，中共命令這批朝鮮人回國展開革命。其中高層領導人回到平壤，大部分基層幹部和戰士則留在中國，加入了中共在東北的部隊，以後擴充人馬，在林彪部隊中組建了朝鮮師、朝鮮團。這些人後來構成了勞動黨內的「延安派」。

中國內戰時期，蘇聯大力支持和援助中共取得東北戰役的勝利，主要是開展貿易、修復鐵路，並開放中朝邊界，為中共軍隊提供運輸通道和後方基地。中共東北局通過抗聯幹部（周保中、彭施魯等）與戰友金日成取得私人聯繫，也獲得一些糧食和武器。不過，中朝兩黨並未發生組織聯繫，直到1948年9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中央尚不熟悉金日成其人。中國革命勝利後，應金日成的請求，在蘇聯的溝通下，毛澤東同意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中的朝鮮族部隊（由方虎山、李德山等指揮）四萬餘人移交給朝鮮，成為朝鮮人民軍的主力部隊。

總體來講，這一時期的中共和朝共（勞動黨）都在莫斯科的領導下，但中朝兩黨之間並沒有組織上的直接聯繫。

二 三角同盟建立，中國甘當先鋒（1949-1958）

1949年7月毛澤東宣布，新中國將採取向蘇聯「一邊倒」的方針。中國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正式成員，並承擔起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不過，毛澤東提出的成立東方情報局的建議，並未得到斯大林首肯。中共中央剛剛進入北平，就在中南海辦起「學習組」，開始組織亞洲各國共產黨領導



沈志華教授(資料圖片)

人學習中共的革命經驗。亞洲各國的共產黨和革命組織都多次派領導幹部到中國取經，只有朝鮮和蒙古沒有參加。顯然，斯大林並沒有放棄對朝鮮和蒙古的主導權。

1950年2月，中蘇在莫斯科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然而，毛澤東堅持要蘇聯在兩年內無償歸還大連和旅順以及中國長春鐵路股份，而且態度十分強硬。旅順和大連是沙俄夢寐以求的在太平洋的唯一出海口，也是蘇聯在遠東地區戰略利益的根本保障，斯大林當然不願放棄。但是，一方面毛澤東呆在莫斯科堅決要求索回，另一方面美國人趁機以統一台灣為誘餌拉攏中國，斯大林不能讓美國的楔子戰

略得逞，只得忍痛接受了中方關於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的協定。只有在一種情況下，蘇聯既可以簽署協定避免得罪中國，又能留在旅順保住軍事基地，那就是在遠東地區出現危機時，中國主動要求蘇軍留在旅大地區。於是，斯大林改變了在遠東尋求平穩的一貫方針，突然答應金日成對南朝鮮（今稱韓國）採取軍事行動。蘇朝密談半個月，商定作戰計劃後才通知中國，毛澤東被迫表示同意。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突然參戰令蘇朝感到意外，毛澤東屢次要求中國派軍隊喬裝入朝作戰，盡快結束戰爭。斯大林判斷朝鮮在蘇聯的幫助下可以單獨應付，故拒絕中國參戰。直到美軍在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全線潰敗，斯大林才要求中國緊急出兵援救。毛澤東力排眾議，在最後關頭決定中國人民志願軍（以下簡稱「志願軍」）單獨赴朝對美作戰，從而履行了亞洲革命領導者的責任，並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和幫助，保衛了新生革命政權的安全和生存。中蘇朝三角同盟由此建立。但是，中朝在軍隊指揮權、南下作戰戰略、鐵路管理權及戰俘遣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意見分歧，爭執不下，斯大林都站在中國的立場，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中國由此取得了在朝鮮問題上的發言權和主導權，卻引起金日成的猜忌和怨恨。

戰爭結束後，中蘇關係進入蜜月期。蘇聯在軍事和經濟上給予中國大規模援助，提供貸款、派遣專家、援建工廠，甚至幫助中國研製核武器。中國則在政治和外交上大力支持蘇聯，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幫助蘇聯新領導層穩定國內外局勢，協助處理「波匈事件」，特別是在蘇聯「宮廷政變」發生後維護赫魯曉夫（Н. С. Хрущев）的黨內地位。中蘇兩黨平起平坐，共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兄弟相稱，親密無間。中朝關係卻在此時進入冰凍期，儘管毛澤東主動向朝鮮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但金日成毫不領情，對中國不理不睬，在朝鮮所有的祖國解放戰爭紀念館中，沒有一件展品和一句解說詞提到中國。金日成在國內大搞個人崇拜，排除異己，獨攬大權，先後消滅了黨內的

「南方派」(南朝鮮勞動黨派)，排擠了「莫斯科派」(蘇聯派)和「延安派」，還針對中國提出反對「事大主義」，確立「主體思想」(Chuch'e/Juche)。

蘇共二十大以後，在社會主義陣營普遍批判個人崇拜的氛圍中，朝鮮黨內受到壓抑和排擠的幹部暗中串聯，以「延安派」幹部為主形成黨內反對力量，意圖逼迫金日成改弦更張甚至交出權力。金日成則利用「八月全會」(1956年8月30至31日召開)打擊反對派，將大批幹部開除黨籍或關進監獄，導致十幾個朝鮮黨政部級和局級幹部逃亡中國(即「八月事件」)。毛澤東為此震怒，周恩來親自接見徐輝等勞動黨逃亡幹部，了解情況，並向莫斯科通報。1956年9月，中蘇派出兩黨代表團一同赴朝，要求金日成改正錯誤。金日成表面服從，虛與委蛇，卻乘中蘇專注處理「波匈事件」的機會，在全國開展「肅反」運動，大規模逮捕「宗派份子」，甚至提出朝鮮退出中朝為一方的板門店軍事停戰委員會，單獨與聯合國談判解決朝鮮半島問題。毛澤東認為金日成是「東方的納吉(Imre Nagy)」，要背叛革命，脫離社會主義陣營，遂與蘇聯商議，試圖採取強硬手段，利用駐朝的四十萬志願軍幫助勞動黨「改正錯誤」。

由於蘇聯在朝鮮問題上採取不配合的消極態度，毛澤東突然改變對朝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親自向金日成承認自己聽信讒言，誤會了他，甚至主動提出將志願軍部隊撤回國，並讓彭德懷登門道歉，承認中國干涉朝鮮內政，犯了大國沙文主義錯誤。1958年10月，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金日成獲得充分的自由和主權，在國內大開殺戒，清除異己，一統天下的金氏王朝由此建立。金日成感恩戴德，號召全國學習中國的大躍進，開展「千里馬運動」。其後，毛澤東與金日成在武漢會談，互相讚許，興高采烈。中朝關係迅速升溫，達到高潮。

三 中蘇兄弟鬩牆，朝鮮左右逢源(1958-1966)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會議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最高峰，也是中蘇友好關係的頂峰。此後，兩國關係開始走下坡路。1958年中蘇的對內、對外政策開始出現分歧，在開展經濟建設方面，蘇聯強調計劃平衡，穩步前進，中國強調「多快好省」，積極躍進；在處理國際問題方面，蘇聯要緩和，主張和平共處，中國要鬥爭，主張革命與戰爭。對於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蘇聯認為缺乏科學態度，不顧客觀條件，急躁冒進，毛澤東對此在廬山會議上大發雷霆。中國炮擊金門，引發台海危機，事先不同蘇聯商量，赫魯曉夫對此極為不滿。蘇聯撕毀核援助協議，停止向中國發送原子彈樣品，又引發中共極度不滿。中印邊境地區發生軍事衝突，中國希望蘇聯在國際舞台上為中國說話，莫斯科卻發表了中立聲明。1959年10月赫魯曉夫訪華，中蘇兩黨會談，發生激烈爭吵。隨後一年，中國在北京世界工會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會議上散發與蘇聯意見不同的材料，莫斯科認為是有意暴露中蘇分歧，破壞團結。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組織對中共代表團「圍

攻」，彭真針鋒相對，毫不讓步。赫魯曉夫氣急敗壞，下令撕毀合同，撤回專家，中蘇分歧開始公開化。儘管1960年底莫斯科會議期間雙方各有所讓步，試圖緩和關係，但實際上面和心不合，只是暫時容忍和等待。隨着1962年5月新疆發生邊民大規模逃往蘇聯的「伊塔事件」，10月中印邊界戰爭和古巴導彈危機爆發，雙方的分歧再次公開化，中蘇同盟終於破裂。

中蘇兩黨分歧不斷加深，對於金日成來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中蘇分裂，毛澤東和赫魯曉夫都要拉攏朝鮮，爭相討好平壤。於是，金日成採取中立態度和等距離外交，左右逢源，兩邊獲利，如魚得水。憂的是三角同盟內訌，難以形成統一戰略，朝鮮的安全失去有力保障。為此，金日成主動提出分別與蘇聯和中國單獨建立同盟關係，並得到兩方認可。1961年7月，朝鮮先後與蘇聯和中國簽署了「軍事同盟條約」——這是朝鮮的內部說法，公開名稱是「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中蘇分手以後，除阿爾巴尼亞，所有東歐國家和蒙古都倒向了莫斯科，而越南（指北越，即越南民主共和國）和朝鮮則腳踏兩隻船。特別是朝鮮，夾在中蘇之間，且距北京咫尺之遙，對中國尤為重要，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能放棄。恰在此時，中國周邊危機四伏：東面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蠢蠢欲動；南面越南戰爭升級，美國步步緊逼；西面中印邊境兩軍對峙，隨時可能爆發戰爭；北面蘇聯向遠東增加兵力，在蒙古駐軍，中蘇關係日趨緊張。如果朝鮮倒向蘇聯，中國真的就「四面楚歌」了。金日成把這一切看在眼裏，不失時機地於1962年4月向中國提出了領土要求。

長白山（朝鮮稱「白頭山」）對於金日成在朝鮮建立和維持金氏家族的世襲統治具有特別意義。一則，長白山被朝鮮人視為王朝的發祥地和聖山，是他們緬懷先祖、保留民族記憶的象徵；二則，朝鮮長期宣傳金日成在長白山密林領導了全國的抗日鬥爭，從而成為民族英雄；三則，金日成謊稱其子金正日出生在長白山密林的營地（實際上出生在蘇聯哈巴羅夫斯克的抗聯營地）。這一切的前提是長白山必須屬於朝鮮，否則何來「白頭山血脈」之說？然而，在中國明朝和朝鮮李朝建立之初，兩國就已確定鴨綠江、圖們江為界河。清朝康熙年間，定界碑立於長白山天池以南十餘里的分水嶺上。天池作為清王發祥聖地劃入中國版圖，而長白山則成為中朝界山。根據1909年的《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俗稱《間島條約》），長白山最高峰（白頭峰）和天池仍然留在中國境內。所以，朝鮮只有索回白頭峰和天池，金氏王朝的正統性和合法性才能得到保證。於是，金日成就在中國處於外交困境之時提出了簽訂邊界條約的要求。毛澤東本來就有「天朝」觀念，又要維持與朝鮮的盟友關係，不得不滿足金日成的要求。1962年10月《中朝邊界條約》簽訂，將天池的大部和白頭峰劃入了朝鮮境內。這是繼撤退志願軍後，毛澤東送給金日成的第二份大禮。

金日成心滿意足，再次向中國靠攏。朝鮮一改在中蘇大論戰中不偏不倚的立場，開始明裏暗裏批評蘇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認為，勞動黨表現積極，「不顧壓力，堅持原則，仗義執言」。1963年5月，金日成還親自率八名「秀才」到中國，與中共「九評」（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起草班子一起討論和修改反修文章〈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毛澤東對此深感滿意。崔

庸健甚至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應轉移到中國來，中國在推動世界革命方面理應發揮更大作用。中朝關係又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然而，不到兩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蘇聯新領導人改變政策，向朝鮮提供了大規模軍事援助，金日成立即向莫斯科示好。與此同時，朝鮮又要求中國提供大量無償的經濟援助。周恩來無可奈何，只能全部滿足朝鮮所求。

四 中國反蘇批朝，蘇朝愈走愈近(1966-1969)

早在1962年毛澤東就提出「念念不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出於對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擔心，中國的國內政策開始全面「左」轉，並且尋找「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印度和各國反動派要和，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的國際背景，把國內和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與國際共運中的現代修正主義聯繫起來。1964年，毛澤東又調整中國的對外防禦戰略，蘇聯成為除美國之外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另一個假想敵。此時中蘇關係的內核已經發生變化，注入了更多國家利益衝突的因素，原來以意識形態為主的兩黨鬥爭開始逐步向以國家安全利益為主的鬥爭轉化，並且出現了領土爭端和軍事衝突等新的因素。隨着這種憂患意識的不斷加強，毛澤東終於下決心發動一場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中共拒絕出席蘇共二十三大大會，標誌着中蘇兩黨組織關係的徹底中斷，在隨後開始的以反修防修為主旨的文革運動中，中蘇兩國關係也走到了谷底。這場政治運動的國內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國外目標主要就是已經復辟資本主義甚至成為「社會帝國主義」的蘇聯。在這種背景下，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很容易就把兩國關係推到無法收拾的境地。8月，北京中學紅衛兵走上街頭，將蘇聯使館門前的馬路改名為「反修路」，並在現場召開命名大會，還在周邊街道貼滿了批判「蘇修」的標語和大字報。1967年1月，中國留蘇學生在莫斯科紅場聚會，遭到蘇聯軍警的圍攻毆打，2月又發生了暴徒闖入中國使館毆打外交代表和工作人員的嚴重事件。在此期間，中國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連數日包圍蘇聯使館，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甚至斷水斷電，使館內的中國服務人員也宣布罷工。此後雙方敵對情緒日趨上升，外交衝突不斷，互相採取報復措施，關係極度緊張。

1968年8月，蘇聯糾集華沙條約國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夜之間佔領布拉格並逮捕了捷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對中蘇關係不啻是雪上加霜，引發了中國更大的疑慮和擔憂。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公開給蘇聯戴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從而為中國全面調整外交戰略作出了革命理念和社會心理的鋪墊。與此同時，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邊界衝突頻頻發生，不斷升級。在文革極左思潮帶動起來的全國上下強烈反修氛圍和反蘇激

情中，黑龍江省軍區制訂了反干涉鬥爭方案並得到中央批准。1969年3月，中國邊防軍偷襲蘇軍巡邏隊，引發了中蘇珍寶島邊境武裝衝突。8月，蘇聯採取報復措施，在新疆鐵列克提地區突然襲擊中國邊防巡邏分隊。中蘇兩國的對抗已經走到了戰爭邊緣。

中國的極左路線在文革初期達到頂峰，令國家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原來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除了阿爾巴尼亞，中國身邊幾乎沒有一個朋友，不是「保修」、「波修」，就是「羅修」、「捷修」，勞動黨也被稱為「朝修」。文革初期，北京街頭大字報抨擊「金日成是赫魯曉夫的徒子徒孫」，廣東紅衛兵小報則揭露金日成生活腐化。在圖們、丹東口岸和鴨綠江水電站大壩工地，中國的造反派組織和知識青年架起高音喇叭，每日數小時向朝鮮廣播，宣傳毛澤東思想，批判修正主義。在革命激情的影響下，中朝邊境甚至接連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朝鮮的火車司機因拒絕佩戴毛主席像章，導致整列火車被扣留數日。中朝關係由此跌入冰點。

文革前中國還可以容忍朝鮮的中立立場，現在卻非要平壤選邊站。朝鮮離不開蘇聯的援助和支持，自然也就與中國漸行漸遠。中共一再施壓，勸告勞動黨不要派代表出席蘇共二十三大，但金日成還是派出了以朴成哲外相為首的代表團。受蘇聯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倡議於1966年5月在平壤開會，討論援助越南問題，但由於中國反對而流產，朝鮮對此非常不滿。外務省要求中國使館從櫥窗中取下有關紅衛兵和反修的宣傳材料，在遭到拒絕後，為避免朝鮮民眾受其影響，朝鮮封鎖了中國使館門前的道路，禁止行人經過。中國強烈反對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朝鮮卻對此默不作聲，甚至在私下對蘇軍的行動表示讚許，認為是「一種積極的態度」。中國駐朝使館在屋頂豎起的標語牌寫着：「反帝必反修」，而朝鮮當局則在其對面豎起了標語牌，上面寫道：「堅決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中蘇早已分道揚鑣，朝鮮卻還幻想着恢復三國的同盟關係。

不過也應該看到，儘管中朝之間外交往來冷淡，社會情緒對立，但是從領導層的角度觀察，雙方都不願見事態擴大，走到分裂的地步。與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關係緊張反映在高層的情況恰恰相反，文革初期兩國的緊張狀態主要反映在社會層面和基層，而雙方領導人則在盡力維持中朝關係。毛澤東、周恩來從未說過朝鮮一句壞話，金日成也非常擔心與中國關係惡化，導致朝鮮腹背受敵。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紅衛兵和群眾運動的偏激迫使朝鮮在三角關係中偏向了蘇聯。由於存在共同的敵人，此時期中蘇朝三方雖然內部不和，但在朝鮮半島問題上至少表面上還維持着一致的立場。

五 中蘇徹底決裂，中朝「破鏡重圓」（1969-1986）

珍寶島軍事衝突發生後，中蘇雙方都作出了異常激烈的反應，相互提出外交抗議，各自組織全國性大規模示威遊行。蘇聯散布言論，對中國進行核

威脅；中國則開始組織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大批黨政機關向內地進行「戰備疏散」，並下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準備打仗。面對蘇聯的戰爭威脅，毛澤東全面調整外交方針，最終作出聯美抗蘇的安全戰略抉擇。

在中蘇兩國處於臨戰狀態的同時，中朝關係卻柳暗花明，出現了轉機。中國與蘇聯的對峙自然迫切需要與朝鮮恢復友好關係，朝鮮因擊落美國偵察機引發半島陷入危機也非常需要得到中國的援助和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朝對國家安全的共同需求為恢復雙方正常關係開啟了大門。196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單獨會見被特意邀請來華的崔庸健，進行了情真意切的談話。1970年4月周恩來訪朝，受到熱烈歡迎。這是自文革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也是中國總理相隔十二年後再次出訪朝鮮。中朝關係終於「破鏡重圓」。

1971至1972年中美高層頻繁接觸、坦誠對話，在雙邊關係及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形成了一致或比較接近的立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將中美建立起來的全新關係稱為「準同盟」，並確信中國已經「堅定地」接受了這種「默契盟友」關係。這種「同盟關係」主要是建立在中美共同遏制和對抗蘇聯威脅的戰略基礎上的，但同時也表現在處理國際關係的其他方面，其中朝鮮半島的局勢就是中美雙方特別關注的問題。通過全面溝通和深入討論，雙方在朝鮮問題上達成一些共識：尋求和維持半島長期穩定與和平的局面；承認朝鮮南北兩方的合法存在並具有對等的政治地位；分別維護朝鮮和韓國的利益同時約束各自的盟友；美軍暫時留在韓國是穩定半島局勢的重要因素。其結果導致中國在處理朝鮮問題時陷入重重困境：既要保持與美國的合作，保障東北亞的和平穩定，又要維持與朝鮮的同盟關係，以防蘇聯乘虛而入，以致在聯合國框架內未能如朝鮮所願實現「和平統一」，金日成對此心生怨氣。

為了拉住朝鮮，中國盡其所能提供了大量軍事、經濟援助，並在方方面照顧朝鮮的感情和利益。然而，所有這些努力終究無法彌合中朝在對外方針政策上出現的裂痕：中國聯美抗蘇，毛澤東提出反霸的「三個世界」理論，朝鮮則聯蘇抗美，金日成試圖維持和恢復對抗美國的北三角同盟；中國加入並維持現有國際體系，朝鮮則繼續推動世界革命；中國強調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朝鮮則為實現統一不惜訴諸武力。最終，中美關係變化導致中朝關係進入了一種貌合神離的狀態。但另一方面，毛澤東和金日成建立起來的中朝同盟具有廣泛而深厚的基礎，這反映在意識形態、外交戰略、經濟聯繫、地緣政治以及領袖個人關係等諸多方面。雖然中美和解導致中朝之間的特殊關係開始發生動搖，但毛澤東的基本理念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構成同盟基礎的這些要素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甚至還得到了加強。一旦中朝之間的矛盾和分歧威脅到同盟的生存，利益的一致性就會驅使雙方調整各自的政策，竭力掩蓋和彌合裂痕，以維繫盟友關係。中朝關係的這種矛盾現象，導致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日益降低，直接影響了1970年代以至後來朝鮮半島局勢的演變。

文革結束以後，中國的發展道路、治國理念和各項政策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對內搞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外開放，積極融入國際政治經濟

體系，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以「改革開放」為標誌的歷史時期。不過，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的狀況並未發生根本轉變。蘇聯繼續向中國施加政治和軍事壓力，包括在中蘇邊界部署五十個師和在蒙古駐扎八萬機械化部隊；部署的武器裝備的數量和質量不斷升級，包括先進的坦克、重型轟炸機、SS-20導彈，以及太平洋艦隊增加了航空母艦在內的二十多艘大型水面艦艇等。蘇聯還提出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先後同越南、阿富汗簽訂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條約。這些行動顯然都具有針對中國的意圖。中國則繼續實施毛澤東提出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一條線」是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歐洲再到美國這一條線上的國家聯合抗蘇，「一大片」是指「一條線」周圍的國家），堅持針對蘇聯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至於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Л. И. Брежнев）做出的緩和兩國關係的姿態，鄧小平則提出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是消除「三大障礙」，即蘇聯從中蘇邊境和蒙古撤軍、蘇聯從阿富汗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中蘇兩國積怨已深，實難在短時間內化解。

文革後中國的變化引發了朝鮮的不安和不滿，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外交上，朝鮮需要中蘇兩國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反對中國聯美抗蘇，因而更加親近莫斯科，允許蘇聯軍艦進入朝鮮港口，為蘇聯飛機開闢「空中走廊」，實際上對中國造成了安全壓力。經濟上，朝鮮負債纍纍，急需大規模援助，中國調整對外援助方針後，雖盡量滿足朝鮮的要求，但朝方仍有極大反感。政治上，中國提倡思想解放，反對個人迷信，朝鮮宣揚「主體思想」，大搞個人崇拜；中國廢除幹部終身制，朝鮮實現家族世襲制；中國放棄世界革命方針，朝鮮崇尚革命輸出，甚至大搞恐怖主義。總體上，朝鮮認為中國正在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儘管如此，朝鮮仍然是中國不可或缺的唯一盟友，中國必須小心翼翼地維護兩國友好關係。因此，中國處理朝鮮半島和中朝關係問題時基本延續了毛澤東晚年的政策，除了堅持中美戰略合作以及東北亞地區必須保持和平穩定的總方針外，在南北統一方式、美軍撤出朝鮮半島以及「交叉承認」（下詳）等一系列具體政策上，中國所有的公開表態都依從朝鮮的意見。

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中國對韓國的態度上。早在1973年6月，韓國總統朴正熙就發表〈和平統一外交政策特別宣言〉，向北京伸出橄欖枝，但考慮到朝鮮南北對峙的狀況，中國未予理睬，甚至表示抵制。中美建交後，韓國再次表現積極，中國繼續冷淡處之，僅允許少量僑民往來。及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韓國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受到中國領導人、政府機構和學者的特別關注，鄧小平多次提到亞洲「四小龍」。為此，中國提出對韓「關門不上鎖」的方針。然而，中韓之間的民間貿易剛剛起步，便遭遇朝鮮的不滿和抗議。中國立即止步，宣布停止中韓貿易。1984年，中國掀起改革開放的第二波高潮，中國更加重視韓國經濟起飛的經驗，中韓民間交往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但是礙於朝鮮的立場和情感，中國雖開始調整對韓關係，但依然堅持「官民有別」、「政經分開」的原則和「只做不說」（可以開展對韓民間交流，但不做新聞報導）的方針。

六 中蘇關係緩和，中朝拉開距離(1986-1992)

1985年是中蘇關係走向正常化的關鍵性一年。3月，戈爾巴喬夫(M. C. Горбачев)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公開表示蘇聯希望並認為有可能同中國改善外交關係。中國立即作出反應，派李鵬副總理訪問莫斯科。198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七次，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將從阿富汗撤軍，從而邁出了消除「三大障礙」的第一步(1988年5月蘇聯開始從阿富汗撤軍，1989年2月全部完成)。同年7月，蘇聯宣布正在與蒙古商談蘇軍撤離蒙古的問題，隨後不久開始履行這一承諾(1987年4月蘇聯開始從蒙古撤軍，1989年5月大部分蘇軍撤離蒙古)。1987年2月，中蘇恢復中斷了九年的邊界談判。通過友善務實的談判，雙方達成重要共識，承認1964年邊界談判中工作小組達成的協議繼續有效。此後，邊界談判輪流在北京和莫斯科舉行，雙方就東段邊界走向大部分達成了協議，並就西段邊界劃界原則達成了一致意見。糾纏中蘇關係多年的邊界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1988年5月，在美國積極配合中國向莫斯科施壓的情況下，蘇聯表示準備同有關各方一起為解決柬埔寨問題作出貢獻。很快，越南便宣布於6月開始從柬埔寨撤出部分軍隊，並於1990年底前實現全部撤軍。此後，中蘇開始籌劃兩國首腦會晤事宜。在中蘇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1月，越南明確向中國承諾，將於是年9月底實現從柬埔寨全部撤軍。至此，「三大障礙」問題已經基本解決。5月15至18日，戈爾巴喬夫正式訪問中國，與鄧小平和中國領導人楊尚昆舉行會談，並發表了聯合公報。中蘇關係恩恩怨怨數十年，終於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務實外交的基礎上實現了國家關係正常化。

在中蘇關係逐漸實現緩和的過程中，中朝之間的距離卻不斷拉開。1986年7月的漢城(今首爾)亞運會是一個轉折點。北京宣布有意參加亞運會之後，朝鮮多次表示不滿、抗議並加以阻攔。然而，儘管越南和蒙古在朝鮮的鼓動下都拒絕參加、儘管開幕前金浦機場發生了爆炸案，中國還是不顧平壤的反對，仍然派出385名運動員參加了比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是參加漢城亞運會唯一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87年7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成立了由田紀雲副總理任組長的中韓經濟協調小組，開始全面調整對韓政策。1988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對韓國的間接貿易發展為民間直接貿易。是年9月的漢城奧運會進一步拉開了中朝關係的距離，推進了中韓關係的發展。朝鮮反對在漢城舉辦奧運會，認為這是美國和韓國策劃的「兩個朝鮮」的陰謀，並提出平壤與漢城共同舉辦奧運會，否則朝鮮將發起抵制運動。中國從維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的願望出發，表示希望朝鮮南北雙方關於共同舉辦奧運會的談判取得成功。1987年7月南北會談失敗，8月朝鮮拒絕了奧委會提出的最終妥協方案。11月29日朝鮮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大韓航空公司客機爆炸案，以此對奧委會進行威脅。然而，就在朝鮮宣布抵制韓國單獨舉辦的奧運會兩天後，中國便向奧委會遞交了確認參加漢城奧運會的信函。

漢城奧運會前後，中韓民間經貿關係和人員交往出現了跳躍式發展。據韓國通商產業部和外務部的統計，貿易總額從1984年的4.62億美元猛增到

1988年30.87億美元；與上年相比，1988年因公訪華的韓國人增長二十多倍，到韓國出差的中國人也增長了十七倍。更重要的是，奧運會後不久，中國開啟了與韓國高層政治接觸的民間秘密渠道。1989年6月的北京政治風波後，中國遭遇美國和西方的制裁，一時陷入外交孤立的困境，中朝關係因此而顯得更加緊密。但與此同時，作為打破西方封鎖、擺脫外交困境的突破口，韓國也成為中國重點交往的對象。1990年4月，經民間團體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的溝通和聯繫，田紀雲在北京秘密會見了韓國鮮京株式會社社長李順石（其董事長崔鍾賢是盧泰愚總統的親家），並請他向韓國領導人轉達中國政府的立場：中國「非常認真對待、非常重視發展兩國關係」，中韓「互設貿易代表處勢在必行」。半年之後，中韓簽署了互設貿易代表處的協議。這表明「政經分開」正在轉向「政經合一」，中國一向奉行的「一個朝鮮」政策開始轉向「兩個朝鮮」政策。

中國很快又邁出了第二步——主張聯合國同時接納朝鮮和韓國為正式會員國。美國早就提出朝鮮半島周邊四國分別與朝韓實現「交叉承認」，但朝鮮堅決反對，堅持半島統一後再加入聯合國的原則，具體方案就是建立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提出單獨入聯的要求，並得到多數國家的贊同。中國過去一直支持朝鮮的立場，但1990年9月改變了態度。從保證半島和平穩定的宗旨出發，中國希望朝韓同時入聯，因此一方面勸告韓國再推遲一年提出單獨入聯，以便有時間去做朝鮮的工作；另一方面警告朝鮮，中國不會在安全理事會否決韓國入聯，如果朝鮮不接受同時入聯，就只能接受韓國單獨入聯的現實。在中國的說服和壓力下，1991年5月朝鮮被迫同意南北朝鮮分別入聯。是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未經表決，同時承認朝韓兩國的聯合國成員國資格。韓國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成員國，實際上就掃清了中韓建交的政治障礙，為中國實現「兩個朝鮮」政策打開了大門。10月4至14日，金日成最後一次訪華，再次提出在美國承認朝鮮之前，「請中國不要同南朝鮮建交」。鄧小平回答：中朝之間還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樣對彼此都好；中朝關係特殊，是兄弟但不是同盟。這表明中國已經有意拉開與朝鮮的距離。

1991年12月13日，朝韓雙方簽訂《關於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協議書》，31日通過《關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這兩份文件於1992年2月19日正式生效。同時，雙方還簽署了《關於組建北南高級會談小組委員會協議書》。1992年1月30日，幾經周折，朝鮮終於同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簽署了核安全協定，從而掃除了美國和日本與朝鮮談判改善關係的障礙。至此，中國認為「交叉承認」已是大勢所趨，中韓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條件已經成熟，遂通過民間渠道通知韓國政府，中國決定與韓國建立外交關係。青瓦台驚喜不已，立即作出積極的回應。中韓建交談判的過程快速而簡單，經過一個半月的三輪會談，至6月底完成了全部準備工作。儘管金日成要求中方考慮南北關係和朝美關係正在發生變化的情況，推遲一年與韓國建交，但中國認為，必須在一貫積極主張改善對華關係的盧泰愚總統任內（即1992年底韓國大選前）實現中韓關係正常化，機不可失。8月24日，中韓簽署並發表了建交公報。

至此，中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實現了從「一個朝鮮」到「兩個朝鮮」的根本轉變，成為在亞洲乃至國際上唯一可以與南北朝鮮同時保持友好關係且施加外交影響的大國，從而既改善了經濟環境，擺脫了外交孤立，又在美日韓同盟中打入一個楔子。然而，令中國和國際社會感到驚訝的是，此後不到一年就爆發了朝鮮核危機，朝鮮半島局勢立即緊張起來，而這種動盪不安的局面一直延續到今天。朝鮮核危機的起因，是歷史學家必須面對的另一個研究課題，這有待於各方檔案文獻的解密和開放。

七 結語

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後的情況尚未進入歷史研究的範疇，大體的發展趨勢是，俄羅斯告別遠東，專注歐洲，基本不再參與朝鮮半島的事務。在處理朝鮮核危機的過程中，中國一方面與美國合作，主導六方會談，主張半島無核化；另一方面維護朝鮮的安全和利益，希望保持東北亞國際關係的平衡，總體目標仍然是維持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目前，中美關係惡化，甚至形成全面和長期的對抗，在客觀上美國再次成為中、俄、朝的共同敵人。俄羅斯為了擺脫歐洲的困境，重新把目光轉向東方，有意經營遠東，並且已經與朝鮮開始了軍事、經濟與外交的合作，現在又千方百計誘使中國加盟。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縱觀中蘇朝三國關係史可以發現幾個特徵：第一，三方立場、政策完全一致的情況幾乎沒有，即便在三國的同盟關係最強盛的時期。第二，中蘇關係友好，朝鮮就受到擠壓，處於被動，始終只能是配角。第三，中蘇關係破裂，朝鮮便取得主動，左右逢源，如魚得水。第四，最重要的是，只要條件合適，三方都希望與美國改善關係，減輕自身的壓力。如此看來，這三國的內部關係很難實現全面和諧，即使面對共同的敵人，也是各有所求；即使走到一起，也存在一個誰當頭兒的問題，它們有可能結成有效的、穩固的同盟嗎？從結果看，如果中國加入俄朝聯盟，那麼必然使東北亞再次回到南北兩個三角同盟對抗的局面，在朝鮮半島重新開啟冷戰，甚至有可能引發第二次朝鮮戰爭。顯然，這樣的結果不符合中國一貫堅持的穩定周邊、謀求和平發展的目標和戰略。

註釋

① 本文引用的史料出自筆者的下列論著：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從「一個朝鮮」到「兩個朝鮮」：中國對韓國認知和政策的轉變（1978-1992）》，即將發表。